

地域文化对苏轼词的影响

焦俊霞

(青海警官职业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0)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不同地域文化对苏轼词的创作产生的不同影响。色彩艳丽的杭州造就了苏轼烛影摇红的风格;豪爽率直的密州却使苏轼词风刚劲雄伟。

关键词: 地域文化; 苏轼; 影响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7-0117(2003)05-0059-03

在苏轼以前,词为“艳科”,女性容貌、男女相思是最为重要的题材。虽然有许多出身、性格、经历各不相同的作家染指于此,但似乎都带着软媚的调子,显示出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相当稳定的风格规定性。这种体裁上约定俗成的规矩与豪放的风格有着遥远的距离。然而,苏轼却将“豪放”与本属“婉约”的词体统一在了一起。这种统一,固然离不开苏轼横溢的天才,但当考察苏轼的宦迹行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豪放词的出现,不可否认受到了地域文化的强烈影响;豪放风格与词体的和谐统一,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创作者对不同地域文化进行整合的结果。

苏轼凭其绝世才华,以健笔一枝,热情地投入到词的创作中去,在宋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此时文人词与市井歌场已呈现出一种疏离的状态,文人自作雅词,尤其是一部分名篇,还是在当时整个社会范围内包括市井中广泛流传。对此,宋人笔记中多有记载,比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载:“《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废尽。”阳居士《复雅歌词》:“元丰七年,都下传唱苏轼的中秋词[水调歌头],并一直传到神宗耳边”,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载:“东坡守徐州日,作燕子楼乐章”,由一稍知音律的逻卒“记而传之”,立刻“哄传城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比之诗文,苏轼开始词的创作较晚。在杭州任通判期间才开始大量作词,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秀丽的山水,繁华的城市以及比其他地区更多的宴飨场合,使得杭州成为大量词作产生的中心。这种特殊的氛围,对苏轼开始词体创作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东海之滨的杭州,西拥水光山色秀甲江南的西子湖,东带气势雄浑雪浪排空的钱塘江,江山本已如画了。杭州五代时为吴越国都,已形成一方文化中心。后经过历代的经营,

作为中国六大古都之一,到北宋时已成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达二十余万户,人口有百万之多。此时的杭州,不仅是江南丝织业的中心,而且江河运输四通八达,海外贸易船帆相望,继唐代诗人白居易等人之为之折腰歌唱之后,北宋嘉佑二年(1057年)宋仁宗命梅挚出任杭州知府,特赐诗以示恩宠,其中就有“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的赞美之词。柳永著名词作[望海潮]也清晰地描绘了当年杭州城的繁荣景象,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至于杭州及两浙的民风,在宋代却没有什太好的口碑,所谓“吴越俗尚华靡”,“杭人素轻夸”。苏轼也认为“三吴风俗,自古浮薄,而钱塘为甚,虽室宇华好,被服粲然,而家无宿春之储者,盖十室而九。”

清丽秀绝的西湖山水,发达的城市经济,市民世俗的享乐方式与华美绚丽的词风显得相当合拍。重美食宴饮的风尚,歌妓小唱便很容易成为时尚的生活内容。歌词创作的繁盛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趋利逐末”而“轻儒”的文化传统,也更容易使人们接受当时仍是纯粹娱乐艺术的词。可以说,杭州一带有着最适宜于词体创作的环境。因此,据统计,整个宋代的词人,“两浙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路”,也就不足为怪了。

同样,苏轼开始词的创作与杭州一地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三载:“东坡倅杭,不胜杯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于应接,乃号杭倅为酒食地狱。”而大小公私宴飨,正是大量歌词产生与消费最典型的环境。同时,这一时期与苏轼交游甚密的人群当中,不乏作词的高手,如大守杨绘,老一代词人张先等。值得注意的是,杨绘和张先都是风流人物,宋人载杨绘“性少慎,无检

收稿日期:2003-06-20

作者简介:焦俊霞(1970-),女,河南平顶山人,青海警官职业学院讲师。

操,居荆南,日事游宴,往往与小人接。”(魏泰《东轩笔录》卷七)张先八十余岁还蓄养家妓,以至苏轼与之有“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今而作诗》)的调笑。大概是由于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缘故,苏轼也开始蓄养歌妓了,据载:“东坡有歌妓数人”(《轩渠录》)。歌妓朝云也买于此。所有这一切,都应当进一步刺激了苏轼创作歌词的热情。苏轼在熙宁七年九月所作[劝金船],就是与杨绘、张先饮流杯堂、唱和所作,填的是杨绘自撰的曲腔,其中“纤纤素手如霜雪,笑把秋花插。尊前莫怪歌声咽,又还是轻别”的词句,使我们不难想见当时杭州一带文人士子们的生活场景。

色彩鲜丽的都市生活给了苏轼很大影响,那种生活方式始终是令他怀恋的。熙宁八年正月十五日,苏轼离开杭州初到密州,即赋[蝶恋花]一首,怀杭州上元之盛: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风味应无价。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乍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同时在密州所作“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的诗句也向人们表述了相同的心境。

苏轼从通判杭州开始到密州前创作了五十多首词,在其总共三百多首词中占了相当的比重。可以说,杭州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诱因。也许苏轼这一时期词与以后成熟的创作相比还显得稚嫩,并未能够形成自己独特的面目,但以词为抒怀传情的习惯毕竟保留了下来,这是日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基础。

熙宁七年(1074年)十二月,苏轼到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至熙宁九年(1076年)十一月离任,在密州的两年,苏轼词的创作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时期,虽然创作数量不如在杭州时期多,但这时苏轼开始有意识地追求词体“自是一家”的面目,使自己的作品“一扫绮罗香泽之态”,在词的创作上真正走向了成熟。[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就产生于这一时期。读了这些词,如同看多了小桥流水,忽见长虹卧波而大江浩荡,如同听惯呢呢儿女之语,忽闻壮士长啸而风起云涌,此词不仅诗风豪放,冲决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藩篱,扩大了词的原本颇为局促的疆土,丰富和提高了词的品位。其少年的狂情,因以心报国、以身许国的内涵,而获得了美学中所谓的“崇尚之美”。

这与密州的民风以及文化传统有着密切有关系。密州,比之杭州则属于另一世界。密州,北宋时属京东东路。《家史·地理志》说京东东路的人“大率东入皆朴鲁纯真,甚者失之滞固”,其俗……勤耕。欧阳修也说“河朔之俗,不知嬉游。”并且,由于是孔子的故乡,京东、路儒学相当兴盛,“专经之士为多。”除了官学之外,密州等地的私学也相当发达。

密州一带的京东人在北宋以强悍勇武闻名。如密州人王述父亲“为盐贼李三所杀,述不肯发丧,手擒此贼,剖心祭其父,乃肯成服。”(《苏轼文集》卷五十一《与滕达道》第六简)苏轼为此向朝廷上疏,为王述求情,神宗最终同意了请求。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不但提到了此事,而且对王述快

意恩仇的举动赞许有加,无疑是对这种民风的认同。

另外,围猎也是一部分密州人重要的生活内容,苏轼任知州时,便时常参与其中。

民风传统对人们的词体观念总会产生一些影响。京东路的人倒不是从不作词,但他们的词往往不是“花间”“尊前”的副产品,虽然作品数量不多,却较早地体现出词风转变的迹象。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李冠的[六州歌头],这可以说是一首开豪放派先声的作品:

秦亡草昧,刘项起吞并。鞭寰宇。驱龙虎。扫欃枪,斩长鲸。血染中原战。是徐耳,皆鹰犬,平祸乱。归炎汉。势奔倾。兵散月明。风急旌旗乱,刁斗三更。共虞姬相对,泣听楚歌声。玉帐惊魂。

泪盈盈,念花无主。凝愁苦。挥雪刀,掩泉扃。时不利,骓不逝。困阴陵。叱追兵。呜咽摧天地,望归路,忍偷生。声盖世,何处见遗灵。江静水寒烟冷,波纹细、古木凋零。遣行人到此,追念益伤情。胜负难凭。

关于这词的作者,历史上有些争论。《朝野遗记》以此首为京东张李二生所作,《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作刘潜词,《词林万选》卷二、《花草粹编》卷十二作李冠词。但不管是“张李二生”也好,刘潜也好,李冠也好,都是京东人,并且李冠和刘潜还都在京东路为官。

陈师道《后山诗话》载:“冠,齐人,为[六州歌头],道刘项事,慷慨雄伟。刘潜,大侠也,喜诵之。”程大昌《演繁露》载:“[六州歌头]本鼓吹曲也,近世好事者倚其声为吊古词,如‘秦亡草昧,刘项起吞并’者是也。音调悲壮,又以古兴亡事实之,闻其歌使人慷慨,良不与艳词同科,诚可喜也。”都道出了此词慷慨悲壮而又迥异于“艳科”的特色,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即使在浅斟低唱的俗艳小曲最为风行的时候,人们对于词体风格的需求依旧是多元化的,豪放词后来的流行,自有其社会基础。

密州特定的文化环境对苏轼词风改变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虽然这种影响在我们所能获取的材料范围内无法清晰地加以描述,但是作为苏轼革新词体的背景、文化氛围、地域民风以及文学传统,这些因素我们不能轻易地忽视。深沉厚重的儒学传统,会促使作者在词中更多更深处寄托自己的政治怀抱;纯朴而“不知嬉游”的民风,也会促使作者进一步减少词这种体裁中固有的脂粉气;而以习武知兵为重要目的的围猎活动,慷慨悲歌的文学传统无疑更有助于作品豪壮风格的发扬,廓清“雌声学语”的词风。而苏轼在密州的创作正体现出这一倾向。

在给鲜于子骏的信中,他曾颇为得意地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可见他有意与柳永缠绵婉约的词风分庭抗礼,在历来长于抒写香艳软媚的儿女之情的词国,高扬一般横槊赋诗的英雄之气。这首词,举行的正是宋代豪放词的奠基礼,由苏轼正式剪裁,他手中的金剪一挥奠礼告成之后,宋代的豪放词家就要纷纷登场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于熙宁八年所作的《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以在密州的一次出猎活动作为题材,“千骑卷平冈”的壮阔场面足以让人激动,更何况作者以汉代抗击匈奴的英雄自勉,要“西北望,射天狼,”驰骋疆场,为国效命,在西北边陲动荡不安的时代,大大增强了这首词的现实意义。整首词声情激越,气势豪迈,一改传统词风中软媚的格调,在柔音曼调的传统中增添了雄健豪迈而飘逸空灵、高昂雄壮而激动人心的新声。

在词中,我们看到的是苏东坡飞扬的“狂态”:年虽四十,却如同英姿勃发的少年,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架着苍鹰。随从的武士们个个头戴锦蒙帽,身着貂鼠裘,戎装一派,千骑奔驰,得得的蹄声如急鼓敲打大地,飕飕的骏马如飓风卷过山冈。他传令侍者告知全城的百姓,快随太守去打猎吧,看他弯弓射虎,象当年的孙权一样。苏东坡高扬的“狂情”:三杯下肚,酒酣气壮,虽然微霜已悄悄侵上双鬓,但他的豪兴更加飞扬。辽国在北方虎视眈眈,西夏在西边频频骚扰,什么时候朝廷象汉文帝任命魏尚为云中太守一样,让他投笔从戎,抗击强敌在边疆?虽然已不再年少,但臂力仍在,雄心犹壮,会把彩绘的强弓拉成满月,打败北辽与西夏,射落天上的星斗天狼。

时年四十,“狂”者,豪气也,越出常度也,沛然恣肆的豪情如烈风巨浪,呼澎湃于全词的字里行间,一直激荡传扬于后世。清代学者王国维说“一事能狂便少年”,而当代诗人郭小川在文革中,也有“原无野老泪,常有少年狂。一颗心似火,三寸笔如枪。流言真笑料,豪气自文章。何时还北国,把酒论长江”的豪语。从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追本溯源,他

们不正是继承了苏东坡的流风余韵吗?

熙宁七年即公元1074年中秋之夜,他写了一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和写于同地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比美的双璧。催生这一首千古名词的,除了高天的明月,就是他对弟弟的怀想之情了。

苏轼的中秋之词动人情肠,仍然是那种深切的现实关照和深挚的人间情怀。“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虚幻的天上不如实在的人间,而人间的悲欢离合则犹如天上明月的阴晴圆缺,振古如斯,这是人人所有的人间悲剧,而且是人类所永远无法摆脱的永恒悲剧。苏轼之词所抒写的正是气力无法胜天的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但他终究是旷达的,也是理想的,他所发出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祝愿,如一柱香火,点燃的是世世代代后来者的希望,如清钟一记,荡起的是千百年来也袅袅不绝的余音。

从通判杭州开始,苏轼开始大量作词。三年的杭州生活,苏轼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繁华都市的生活方式,对词这种体裁的掌握运用,苏轼已是熟能生巧,游刃有余,以词体抒怀言情的习惯也保留了下来。而当苏轼来到密州,密州特定的文化环境、文化氛围便强烈地影响着,促使他在词的创作上去柔靡之风,发振拨之音,自觉地以豪壮的声调,以超越的意识入词,最终是使词这种体裁完成了从伶工歌女之词向士大夫抒情言志的转变。他以一枝纵横捭阖的健笔,开拓疆土,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为花娇柳媚的词坛,吹来一股前所未有的豪放刚劲的雄风。由苏轼所奠基的“豪放词”,到南宋时由李纲、岳飞、陆游、辛弃疾、张孝祥等人发扬光大,终于与“婉约词”二水分流而双峰对峙。

the Influence Regional Culture on Su Shi's ci

JIAO Jun-xia

(Qinghai Policeman Vocation College, Xining Qinghai 8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mainly introduces that different regional cultures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 on creative work of Su Shi's ci. The bright-colored Hangzhou causes Su Shi's ci mild, While the bold and Uninhibited Mizhou makes his ci include a vigorous and sprightly style. Living in the country which took charm and mildness as beauty.

Key words: regional culture; Su Shi; influence